【第六章】 結論——郁達夫文學之到達台灣

從文化傳播和接受之層面來看，文學並非僅限於某一地區內部的現象運作，討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文學受容關係更是如此。本文研究意識原點是將郁達夫置於東亞之中台灣文學發展的延伸範疇，並視之爲台灣文學構成的眾多面向之一，從而尋求其作品及思想產生的歷史語境，以連接至戰後郁達夫之於台灣文學場域的種種脈絡。將台灣文學結合中國新文學作家的研究，藉由各個時期報紙、期刊的文字討論、編輯記事、文學活動消息，輔以當時及其後作家的回憶文字與若干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進行探討，以文本或以理論、史料重述台灣詮釋的郁達夫。討論作家及其文學脈絡，首先必須找出文學史上的位置，因此這篇研究以 1945 年爲時間分段，除 1945 年戰前台灣日治時期郁達夫受容的討論外，戰後則以「解嚴」作爲另一個時間段落，展開郁達夫在台接受過程的探究。透過戰前、戰後各種史料資料與理論詮釋的分析和比較，全面形構郁達夫在台灣的形象演變與受容歷程，提示一種台灣文學研究的新路徑。

郁達夫的文學活動可謂貫穿中國新文學運動至中日戰爭結束的時間段落，因此從郁達夫的學識養成談起(1913－1922 年)，釐清中國新文學運動對當時中國社會與知識分子的衝擊與影響，以及身處文學運動浪潮之下郁達夫對五四文學、思潮與日本近代文學的承繼，進而鋪陳出作家文藝思想的根本矛盾與淵源。在此認識之上，以兩大報刊《台灣民報》及《台灣日日新報》接續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之於中國新文學受容的討論，說明台灣文壇已對中國文學有意識地展開閱讀。並從郁達夫在台的人文活動證明台、日兩方各自的政治意圖，支撐郁達夫於東亞文化圈的跨界性，以及其與台灣知識分子之間共同的身份境遇。標明日治時期的台灣郁達夫即中國文化脈絡在台的印記，也是台灣知識論述的一部分。

1945 年逝世的郁達夫，仍持續於戰後台灣進行不同階段的形象變化。五〇年代以來政府文藝政策對文學內容的扭曲，抑壓了郁達夫在台灣的詮釋廣度與資料流通。至六、七〇年代國外郁達夫研究成果的譯介，加上政治、文化環境的鬆綁，始有夏志清、李歐梵等旅外學者對郁達夫詮釋的突破，宏觀地從中國新文學發展脈絡談論郁達夫；並有林海音、張秀亞爲首的女性作家以文學角度爲郁達夫其人及文學翻案。顯見解嚴前的台灣已逐漸跳脫文藝教條，客觀參照郁達夫文學的美

學內涵，顛覆蘇雪林、尹雪曼、鄭學稼等人早期論述的作家印象。而解嚴後迄今，除了接續戰後郁達夫相關研究專書上屬多的作家傳記，或郁與王映霞之間的愛情故事之外，以評論郁達夫個人作品爲重心的藝評亦不在少數。不過直至八〇年代後期，郁達夫才正式作爲學院內的研究專題。同時因爲社會文化的開放和新史料的出現，郁達夫的討論場域、方式、題材愈趨多元；學院研究之外，台灣當代報刊與郁達夫愛情敘事的討論，亦展現出台灣社會對中國文學解讀的大眾認知與消費。觀察日治時期、戰後戒嚴期間乃至解嚴後的台灣，當中郁達夫的形象雖然一再翻轉，但其演譯脈絡卻始終受到政治結構的牽制，近當代的史料調查與重建也多半解釋郁達夫既有的史實問題，因此解嚴後的台灣只得在政治管轄之外的作家愛情軼事上，尋找一個新的郁達夫。

本文就文化生產、流通和接受的模式，以及文學在各個歷史階段中的變化，討論郁達夫的文藝養成、人文活動，與「作家—讀者」之間的文學受容關係，並對受歷史環境制約的場域路徑做一確切的描述。換句話說，討論台灣文學對「郁達夫文學」受容的相關研究，是將台灣文學各個發展階段的意識形態取向，和政治、文化、市場邏輯的制約性，與郁達夫文學的受容過程做更具體的因果連結與對話。依歷史之序討論郁達夫文學在台灣的想像、論述與實踐：日治時期的郁達夫文學，可謂是中國、日本與台灣互文關連的起點。各別自日本殖民政府與台灣本土知識分子的立場，從而賦予不同的文化論述，郁達夫之於日本官方是具東亞親善的文化統合人物；但是對台灣知識分子而言，具中國政府官員身分的郁達夫則兼具新舊文學代表及國族意識的反殖民意義。郁達夫在日治時期的文化實踐上可謂政治意義大於文學意義。

戰後至解嚴前的郁達夫在台接受歷程，與前一階段(日治時期)相同的是，郁達夫文學進入台灣文化場域所產生的問題，亦隨著台灣種種文化、政經資本的潛在矛盾而起伏；然而戰後不同於日治時期官方、民間雙方對郁達夫詮釋的同步性，而是具有明顯的階段性變化。戰後初期以至一九六〇年代末因爲國民政府文藝政策的轉變，先後制約了郁達夫文學在台傳播的可能，徒然成爲選擇性的文學現代化基礎，而非全盤接受；到了六、七〇年代隨社會氛圍的逐漸鬆綁，郁達夫文學才逐漸開展其抗日反共之外的美學論述，甚至有作家生平傳記的討論補充。這個階段郁達夫文學的文化實踐逐漸從政治論述轉移至美學討論之上，郁達夫的形象也不再強調愛國抗日，而是加強其身爲中國新文學作家的文化意義。延續七〇年

代對五四和三〇年代作家作品的開放聲音，解嚴後郁達夫文學的意義又再次翻轉。這個時期的解釋異於解嚴前對郁達夫文學多採取政治傾向的解讀方式，而是大力開展學院研究，在文化解放中結合台灣在地歷史經驗擴化文本，並以大眾敘事不斷地介入郁達夫文學的詮釋。至此，台灣對郁達夫文學的詮釋場域與角度，已從日治時期、解嚴前官方爲主的政治性論述，或解嚴前後對其美學的討論，走入民間大眾中一個「人」的敘事實踐。整體看來，各個階段的郁達夫在台灣文學不斷「重寫」的歷史語境中，是以一種相應於歷史進程的必然性而存在。

文化意義和象徵的創造、傳播與受容，於公共領域中互相激盪強化，是社會發展歷史意識與自我定位的重要憑藉。郁達夫文學之到達台灣的詮釋中，其作品及思想的階段性變化，正顯現台灣各歷史時期對中國文化論述的態勢。日治時期的台灣可謂存在著三種郁達夫詮釋：中國郁達夫、日本郁達夫、台灣郁達夫。「中國郁達夫」指的是作家本身對自我的陳述，從第三章郁氏訪台的講座，可以勘查出在台灣的殖民環境下，郁對台灣釋放一種民族論述的訊息(參閱第三章第二節)；「日本郁達夫」則是殖民政府形諸政治論述下的工具，對照 1937 年 1 月 14 日《台灣日日新報》對郁達夫的介紹：「福州に在つて日本の理解者として同文同種の誼みに立ち兩国民の親善に努めてゐる。」可以得證[396]；「台灣郁達夫」則爲台灣知識分子的集體建構，透過作品閱讀、文本書寫和與作家往來的親身經驗，所堆砌的祖國文化形象標的。三者相對於日治時期台灣的意義，「台灣郁達夫」的本質顯然較其他二者來得豐富。「台灣郁達夫」不僅轉化「日本郁達夫」的殖民意涵，更能吸納「中國郁達夫」所蘊含的國族與文化意義，強化台灣文化論述的正當性與國族意識(參閱第三章第三節)。可以說台灣在接受郁達夫之初，就已經能主動地進行作家意義的生產。

郁達夫文學在戰後台灣的受容如同繫上「魯迅情結」般，同樣成爲了禁忌[397]，對於其敘事的轉移與再現，都在國民政府的政治規範和道德訴求下展開。因此日治時期「日本郁達夫」的論述已被全然屏除，剩下的「中國郁達夫」及「台灣郁達夫」則爲官方所利用變造，選擇性地留存。戰後的郁達夫形象被官方文藝陣營

[396] 台灣日日新報編輯部，〈支那文學の變遷(一) 郁達夫氏の講演 紹介の言葉〉，《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1 月 14 日)，(台北市：五南復刻出版，1994 年)。原文翻譯爲「身爲福州的日本理解者本於同文同種之情誼，致力於兩國國民的親善。」(此段文字爲論文筆者自譯)

[397] 關於「魯迅情結」的討論，參見中島利郎，〈戰後初期台灣文壇與魯迅〉，《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前衛，2000 年)，頁 124-125。

不均等地切割，作家情感生活及文學方面爲戰後台灣文壇所抨擊，蘇雪林視郁達夫爲「人品不高，藝術又惡劣」之等；其後郁達夫的文化活動則被劉心皇引述爲志士抗日的表現，淪爲官方反共愛國的文藝號召。在這個作家形象失衡的變造過程中，間有林海音、張秀亞、夏志清等人提出的文學郁達夫，但在國府的強勢壓制與三〇年代史料不足的狀況下，仍未獲得文壇主流的意見支持。解嚴後全面解放的自由氣氛，讓郁達夫詮釋再度處於斷裂或延續的緊張狀態中，「郁達夫」成了台灣文壇面對中國五四文學斷層，所急欲填補的空白。除了研究場域和方式的轉變，解嚴後郁達夫思想與文本的信息量亦大增，使得個人介入作家詮釋時有所挫折(如劉心皇)，因而發展郁達夫閱讀的另一條路子——愛情傳記的消費，顯現台灣閱讀大眾亟求新認知架構的動機。至此，在郁達夫演繹(root(根)/routes(路徑))的衍生意義之上[398]，已行破除前世代郁達夫論述之「根」，成爲一種普羅大眾實踐自我的敘事「路徑」。

文學受容向來是促進文化發展與進步的重要動力，郁達夫之於台灣文學場域的種種脈絡，說明郁達夫或中國文學確曾對台灣文學的發展產生作用。本文一路從一〇年代討論到現今郁達夫文學之於台灣的詮釋脈絡，可以發現其影響不僅是時間上的縱貫，更是種跨越空間界線的文化發展型態。一個文學傳播場域結構（包括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傳播路徑）所關聯的不單是文學經典如何與時常新，更是與當代的心靈適應息息相關。可以知道台灣各時間段落中的「郁達夫」，因爲政治、國族、文學、社會等不同程度的制約影響，遂於再閱讀、再評價、再書寫的詮釋歷程中被賦予相異面貌。但是這些面貌迥異的郁達夫，都是參照過台灣歷史，酌以詮釋者自身文化脈絡之後的在地性生產。因此，郁達夫之於台灣文學研究的意義，就在於辯明作家與文本、作家與作家、作家與讀者之間的各種文化複數實踐，以及對典律化的作家研究圖式之破除。

本文梳理的郁達夫文學到達台灣之受容緣起、發展、傳播機制及其相關的文學內外部問題，透過台灣文學這個公共論域，彼此相互的論證、辯駁，不但助於台灣文學本體性的確立，且克服歷史與審美的分離狀態，掌握部分中國文化脈絡

[398] 邱貴芬，〈「在地性」的生產：從台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市：麥田，2007 年 8 月)，頁 329-330：「當代文化研究在演繹”root”(根)/”routes”(路徑)的衍生意義時，往往暗示兩者的對立，而且前者與土地認同的連結，代表凝固、封閉；相較之下，後者(路徑)意味『空間』，代表流動、開放。以”root”/”routes”的辯證證諸台灣文學的形構：台灣文學研究向來重視在地想像，但是其中『根』的形成過程當中已布滿各種曲折流動的跨文化路徑。……換言之，台灣文學的”root”和”routes”並非對立，而是互相糾結。」

之於台灣文學的定位及詮釋。就一個文學接受史而言，隨著台灣歷史階段各社會層面的變化，郁達夫文學體現了台灣文學史本身多元包容的特性，並刻劃台灣文學發展歷程中每個時代變化的客觀性質；另一方面，文學接受過程是閱讀大眾與情境特質的互動中所進行的詮釋活動，所以郁達夫文學到達台灣之後，即自然地結合台灣在地的歷史文化意識，使閱讀大眾主動以本土經驗作爲主體意識的出發點，連結台灣的歷史經驗與生活面向，開發郁達夫文學本身的新意義。綜上看來，不論是日治、解嚴前抑或是解嚴後的台灣郁達夫，都有著異於中國或日本等其他各地之於郁達夫的詮釋面向及意義，這是台灣的郁達夫研究所不可被取代的。

透過日治到戰後郁達夫在台灣接受過程之再檢閱，當可提醒我們對文化、歷史、政治任一人文範疇的再省思。以及對於文學既有的傳承關係和曲折脈絡的思辨。如同王德威所言：「我們的研究其實可以同中求異，作得更細膩、更具辯證潛力些。重為大師、經典定位，找尋主題、風格、意識形態所歧生的意義，追溯作者『始』料未及的創作動機等，乃成為亟待持續進行的工作。」[399]挖掘主體意識內潛在的作用，或質疑單向史觀的目的性與不可逆之陳述模式，都是辨明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往來互動關係的方式，也是一種持續的反撥與超越。因此，回歸追溯「始」/「史」的研究立場，郁達夫文學的論述實踐都足以豐富對於台灣文學研究或文化史研究等不同層面的理解，亦有另一番開啓當代的意義。更重要的是，藉由台灣歷史階段中各個郁達夫形象的展現，能得以辯證台灣各時代演變的本質，於論述中顯示獨特的台灣意義。

[399] 王德威，《眾聲喧嘩 • 序》(台北市：遠流，1988 年)，頁 6。